

老子“著书”事件的文本新解与历史地理重建

张卫东

独立研究者, 辽宁 大连 116000

DOI: 10.61369/ETR.2026120048

摘 要： 老子著《道德经》五千言而后隐，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叙事。然而，传统解读将此事件定位于秦国函谷关、归因于“关令尹喜”，在历史逻辑层面存在诸多矛盾。本文从文献考辨与历史地理的综合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研究表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至关关令尹喜曰”的正确句读应为“至关，关，令尹喜曰”，揭示“令尹”为楚国最高执政官、“喜”为情态动词而非人名。结合公元前479年楚灭陈的历史背景，老子作为陈国遗民“被动南归”楚地，途经楚国北境冥厄塞（今河南信阳平靖关）。在此边疆场域，巡边的楚国令尹与南归的老子相遇，其“强请著书”的行为，本质上是楚国在完成军事扩张后对中原核心文化的一次主动“征用”。郭店楚简《老子》出土于楚都贵族墓，墓主为“东宫之师”，为此一解读提供了关键考古证据。同时，通过对《庄子》“关尹”的重新解读，打通了《史记》与《庄子》的记载鸿沟。本文的结论将老子著书事件从西部秦关的固化叙事中解放出来，并为理解《老子》在孔子及早期儒家著作中“缺席”的长期谜题提供了合理解释。

关 键 词： 老子；历史地理；楚文化；令尹；关尹；郭店楚简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and Historical-Geographic Reconstruction of Laozi's "Book-Writing" Event

Zhang Weidong

Independent Researcher, Dalian, Liaoning 116000

Abstract： The story of Laozi writing the Tao Te Ching before retiring is a core narrativ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locating this event at the Hangu Pass and attributing it to "Guan Ling Yin Xi" presents multiple contradiction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correct punctuation of the sentence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hould be "Zhi Guan, Guan, Ling Yin Xi Yue," revealing that "Ling Yin" was the highest executive officer of Chu and "Xi" is a modal verb expressing joy. Integrat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u's annexation of Chen in 479 BCE—the year of Confucius's death—Laozi, as a remnant of Chen, "passively returned south" to Chu territory, passing through the Minge Pass in northern Chu. The patrolling Chu Lingyin encountered the returning Laozi, and the act of "insisting that a book be written" was essentially an active "appropriation" of Central Plains culture by Chu. The Guodian Chu Slips Laozi provide ke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upporting this interpretation. Through a reinterpretation of "Guan Yin" in the Zhuangzi, this paper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ancient texts. The conclusions liberate the event from the fixed narrative centered on the Qin pass and explain the long-standing puzzle of the Laozi's absence in early Confucian writings.

Keywords： Laozi; historical geography; Chu Culture; Lingyin; Guan Yin; Guodian Chu Slips

引言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1]。这段文字被视为老子创作《道德经》的最权威记载。然而，传统解读将此句读作“至关，关令尹喜曰”，从而衍生出“老子西出函谷关为关令尹喜著书”的传说，实则在历史逻辑层面存在诸多矛盾。

首先，地理方向之悖。老子为陈国相人（今河南鹿邑），其故里地处淮北。离周归隐，最合理的路径应是南返故土，而非西出与己无地缘关联的秦国。其次，官制事实之悖。秦国关隘长官称“关都尉”或“关啬夫”^[2]，遍检史料绝无“关令”之称。再次，行为逻辑之悖。一位边关守将，既无识别老子思想价值的学术素养，亦无“强令”前周室史官著书的制度权威。这些矛盾提示我们必须对事件的地理坐标与人物身份进行重新审视。

作者简介：

张卫东（1965—），男，辽宁大连人，独立研究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历史地理、文献考据。

一、文本的重新解读：“至关，关，令尹喜曰”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通过重复关键地名以实现语义强调，是一种重要语法手段。《史记·魏公子列传》载：“公子至邲，邲，矫魏王令代晋鄙”^[1]。此句中，“至邲，邲”的结构与“至关，关”完全一致，第二个“邲”字独立，意为“到达邲地，在邲此地”。《左传·宣公二年》“触槐，槐而死”^[2]，后一“槐”字独立指地。因此，“至关关”的正确读法应为“至关，关”，意为“行至关隘，在此关隘之地”。

“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独有的最高行政长官称谓。《左传·庄公四年》载令尹事迹，杜预注：“令尹，楚相也”^[3]。《史记·楚世家》亦屡见令尹记载^[1]。与“令尹”之确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令”一职在周秦两汉职官体系中查无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关隘长官称“关都尉”^[4]，睡虎地秦简称“关嗇夫”^[5]，张家山汉简亦无“关令”之称^[6]。由此可见，“关令”乃后世误读所生造的复合词。

“喜曰”是先秦史籍记载人物欣喜发言的固定句式。《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喜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3]《国语·晋语四》：“（文公）喜曰：‘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7]《史记·淮阴侯列传》：“（汉王）喜曰：‘如彼教者。’”^[1]以上诸例，“喜曰”意为“惊喜地说”。据此，“令尹喜曰”当解作“令尹惊喜地说”。

综上，原文正读应为：“老子至关，关，令尹喜曰”——老子来到关隘，在此关地，楚国令尹惊喜地说道。

二、历史背景与地理枢纽

公元前479年，据《左传·哀公十七年》明确记载，“楚公孙朝帅师灭陈”^[3]。是年，亦是孔子逝世之年。陈国自西周以来即为中原文化核心区之一，其都城陈（今淮阳）控扼南北交通咽喉。

老子为陈国相人，其故里后称楚苦县^[1]。楚灭陈后，老子从“陈国士人”转变为“陈国遗民”，其归隐从主动的文化选择变为母国沦丧后的被动南迁。从行为地理学分析，老子离周（洛邑）后的唯一合理选择，只能是南返已成为楚地的故里。此路线沿汝、颍水流域东南行，是连接中原与淮城地区的成熟通道。

老子自洛邑南归，必经陈城。自陈城向西南，即进入楚国为防御中原而构筑的北部防线——楚方城。楚方城依托桐柏山、大别山险要地形，以关塞联结而成^[8]。

穿越楚方城的关键隘口，即著名的“义阳三关”：大隧（今武胜关）、直辕（今九里关）、冥厄（今平靖关）。三者之中，冥厄塞（又称崑塞）的战略价值最为突出。石泉考证，冥厄塞地处桐柏山与大别山之间最狭窄的隘口，是连接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唯一便捷陆路通道^[9]。《战国策·楚策四》载：“填崑塞之内，而投己乎崑塞之外”^[10]，其作为楚国生死门户的军事地理意义可见一斑。

从路径最优原则判断，从陈城方向南行者，无论是前往楚都郢城还是东折至苦县，取道冥厄塞均为最优选择。因此，冥厄塞

是老子南归路线上最可能被记为“关”的地理节点。在此边疆场域，巡边的楚国令尹与南归的老子相遇，其“强请著书”的行为获得了历史逻辑上的合理解释。

三、事件本质与文化意义

令尹身为楚国最高执政官，其权威足以与曾任周室守藏史的老子对等对话。此非边关小吏与流亡者的权力落差，而是国家精英与天下贤士的相遇。楚灭陈后，楚国面临如何治理、消化这片中原文化深厚的新领土的挑战。代表楚国挽留老子并“征用”其思想，是一项极具象征意义与实用价值的政治文化行为：既是对新附地域精英的礼遇与吸纳，亦是楚国直接获取高级文化资源。

《庄子》书中屡见“关尹”，《天下篇》以“关尹、老聃”并称，赞其“古之博大真人哉”^[11]。《吕氏春秋·不二篇》亦云：“关尹贵清”^[12]，与老聃、孔子并列，足见其在先秦思想史中的崇高地位。

《庄子》以官职称人的惯例甚多，如“庖丁”“轮扁”等。“关尹”之“关”，正指其遇老子之关隘；“尹”即其本官“令尹”之省称。故“关尹”即“守关之令尹”的简称。此解打通了《史记》与《庄子》的记载鸿沟：《史记》载令尹于“关”遇老子，《庄子》称此人即为道家重要人物“关尹”。《汉书·艺文志》著录《关尹子》九篇，班固自注“名喜，为关吏”^[4]，此乃汉代已形成误读的确证。但所有指向都是这位令尹。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期竹简《老子》，为上述解读提供了决定性考古证据。该墓位于楚都纪南城附近，墓主被推定为曾任“东宫之师”的楚国太子老师，下葬年代约为公元前4世纪中期。此一发现表明，《老子》思想在战国中期已被楚国最高统治阶层接纳尊奉，其早期传播中心正在楚国。思想文本的生成空间（楚边关冥厄塞）与早期传播核心空间（楚王廷），由此构成完整的地理逻辑链。

公元前479年楚灭陈，此年恰为孔子逝世之年。这一时间点的重合，对理解《老子》的早期传播具有深刻的思想史意义。为何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及其早期弟子著作中从未提及《道德经》？若依传统说法，老子著书早于孔子，则此“缺席”难以解释。然而，根据本文考辨，老子著书发生在楚灭陈之后，其时孔子已不在人世。《老子》成书后，最初仅在楚国上层流传，至战国中后期方广为人知，故战国早期文献中未见引用，而《庄子》《荀子》《韩非子》中则屡见称引。此“早期沉默”现象，恰恰从反面印证了本文对老子著书年代的重新定位。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史记》关键文本的重新解读、对老子南归路线的历史地理重建、对《庄子》“关尹”的重新辨析，以及对郭店楚简考古证据的综合运用，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文本正解。《史记》“至关关令尹喜曰”的正确句读应

为“至关，关，令尹喜曰”。“令尹”为楚国最高执政官，“喜”为情态动词，意为“惊喜地说”。

第二，空间重置。老子著书事件并非发生于西部函谷关，而是发生在楚国北境冥厄塞（今河南信阳平靖关）。此一定位由公元前479年楚灭陈的历史背景、老子南归楚地的必然路径共同决定。

第三，人物互证。《庄子》中的“关尹”并非后世附会的“关令尹喜”，而正是本文所论的楚国令尹——“关尹”即“守关之令尹”的简称。

第四，事件重释。此事件的本质，是楚国在完成军事扩张后，于边疆对中原核心文化进行的一次主动“征用”。

第五，年代互证。老子著书发生于公元前479年楚灭陈之后，此年恰为孔子逝世之年。这解释了为何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及其早期弟子著作中从未提及《道德经》。

将老子著书事件从西部秦关的固化叙事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楚国的历史地理语境中，不仅解决了传统叙事的逻辑矛盾，也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坚实而具体的案例。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5]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6] 徐元浩. 国语集解 [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7] 徐少华. 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 [8] 石泉.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 [9] 刘向集录. 战国策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10] 郭庆藩. 庄子集释 [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1] 陈奇猷. 吕氏春秋新校释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2]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